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中国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路径探索

文>翁彦 巩芳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1

摘要: 在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下,中国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通过异域实践、战略实施、独立生态和回归社会四个维度的功能整合,共同促进教育与经济的跨境发展。然而,在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中,分别面临目标达成、环境适应、整合和模式维持的可持续发展困境。为应对这些挑战,可以通过明晰地位一角色、建立制度规范和内化共同价值,构建起稳定高效的结构功能主义生态系统,从而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 走出去;结构功能主义;高职院校;企业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已逐渐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全球经济互联互通的关键力量。十年间,“一带一路”从亚欧大陆扩展至非洲、拉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拉动了数万亿美元的投资规模。据统计,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已为当地创造超过42万个就业岗位,贸易投资累计进出口总额达19.1万亿美元,双向投资超3800亿美元,^[1]有力推动了合作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在此背景下,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对深化国际产能合作、促进技术和文化交流、助力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近年来“走出去”的现状来看,大多数“走出去”项目面临可持续发展困境,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项目运营情况和成功经验的总结,较少从理论角度深入解读这种合作模式的内涵,并探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社会学理论认为,分析社会结构是理解所有社会现象根本的起点。本文以结构功能主义作为理论框架,分析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模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试图揭示其可持续发展困境的根源,为校企协同“走出去”提出发展建议。

一、理论与反思:结构功能主义视阈下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教育功能的展现

(一) 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阐释

结构功能主义可以溯源到早期社会学理论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有关论述。孔德认为:“社会是类似于生物的有机整体,并由各种要素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有一种‘普遍的和諧’关系。”^[2]斯宾塞具体发展了孔德的结构思想,引入了“功能需求”的概念,将社会比作生物体,强调社会各部分如同器官,各有其功能,共同维持社会体系的稳定和健康。涂尔干则视社会结构为具有固有功能的机制,认为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依赖法律、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等社会事实,约束个体行为,特别强调社会团结,相信社会是因其成员享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而连为一体的。^[3]借鉴早期的研究成果,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于1945年正式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创立了以AGIL功能分析图为代表的理论分析框架。根据AGIL图,任何社会系统都履行着四种基本功能,即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以及模式维持(latent pattern-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的发展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22SJYB082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翁彦,女,汉族,江苏常州人,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教育管理研究;
巩芳,女,汉族,江苏徐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轨道交通自动控制。

maintenance)。“适应”描述了社会系统与环境的互动,要求对外部变化做出响应以获取资源,确保生存和发展;“目标达成”涉及社会系统设定目标、调动资源和制订计划的能力,以有效实现这些社会目标;“整合”关注社会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和一致,确保社会整体的协同与和谐;“模式维持”聚焦社会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与内化,确保文化连续和身份认同通过社会化过程得以代代相传。这四个功能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分析和理解社会系统稳定与变化的基础。

(二) 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的发展现状

当前,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主要是由职业院校与中资企业在(境)外共建职业院校、开展项目合作、设立教育基地以及托管中国企业的海外培训中心,主要形式包括学历教育、职业培训、标准开发、专业发展服务等。

学历教育通过境外办学和来华留学教育项目,提供专科和本科层次的教育,培养与企业需求紧密对接的本土化人才。如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与红豆集团在柬埔寨合作设立的西哈努克工商大学,为柬埔寨及东南亚地区提供本科及专科级别的学历教育;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携手华为技术柬埔寨有限公司、柬埔寨电网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柬华应用技术大学,提供本科学历教育;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合作,通过来华留学项目,为埃及斋月十日城铁路工程培养技术人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共建留学生校外实训基地,为企业定制培养泰国来华学历留学生。

职业培训包括企业员工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和汉语水平证书培训等,培养符合企业全球化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如山东47所高职院校联合建立了15个中国海外职业技术学院校区,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中国铝业集团等10家中央企业、地方特大型企业提供员工培训服务;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中国中铁和中国中车共同创立“中—马合作学院”,专门为企业定制并实施针对外籍和外派中国员工的培训计划;武汉交通职业学院为森大集团在肯尼亚、加纳等非洲海外基地的员工提供“中文+技能”培训;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与泰国三所职业院校及北京中车行签约,为泰国的教师、留学生和从业者提供“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和考试认证。

标准开发是指制定并推广满足合作国实际需求的职业教育标准,填补合作国相关专业国家教学标准的空白。如天津职业院校联合中外企业,通过“鲁班工坊”平台与国际伙伴共研适应特定国家的教学标准,并最终将这些标准应用于境外,纳入合作国家的教育体系。这一方式促进了13类、49个专业在20个“鲁班工坊”中的应用,融入合作国教育体系,推动了职业教育标准的国际传播。截至2022年,天津职业院校共完成了105个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的建设,并进行了集册出版。

专业发展服务主要涉及培训当地教师和管理团队,以及为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管理咨询服务。如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职业院校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肯尼亚教育部大中专升级改造项目提供境外教师培训及管理咨询服务,“鲁班工

坊”采用中国标准培训当地教师和管理团队,推广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技术应用,实现教学团队本土化,促进本地人才培养;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向广西恒宝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柬埔寨的分公司派遣实习生,负责设备维修和人员管理,有效解决了公司海外设备维护和管理人才短缺的问题。

(三) 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模式的功能分析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发展依赖于其各部分功能的协调一致。在这一框架下,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的合作模式构建了一个复合互动网络,通过异域实践、战略实施、独立生态和回归社会四个维度的功能整合,共同促进教育与经济的跨境发展。

1. 异域实践体现适应功能

结构功能主义中的“适应”功能强调社会系统需要不断调整以适应环境变化。“走出去”项目跨越地理和文化界限,通过在不同文化和经济环境下的积极探索和实践,促进教育资源的国际流动和知识技能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一过程中,高职院校与企业携手,共同研究并调整教育内容、教学语言和教学方法,确保教育与技术创新能够本土化适应,满足当地社会的实际需求。

2. 战略实施体现目标达成功能

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是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国家层面明确鼓励高职院校“随企出海”。教育部发布的《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职业学校建设指南》提出了“坚持‘教随产出、校企同行’,‘走出去’和‘引进来’双线发展并有所侧重,持续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的目标任务。^[4]在地方层面上,各地区的高职院校根据宏观战略目标,制订符合地方特色和企业需求的协同“走出去”计划,积极整合全球资源,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3. 独立生态体现整合功能

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中外参与各方的利益关系。在推进学历教育、技术培训、标准开发和专业发展服务的过程中,该模式整合了标准、师资、教材、资金、场地及设备优质办学资源,通过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形成协同效应,构建跨界多领域协同发展的教育生态系统,发挥了综合效力。

4. 回归社会体现模式维持功能

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依赖于参与各方对中华文化和办学理念的内在认同。通过开展中文教育、输出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以及在教学中融合中国文化元素等方式,将中华文化教育办学理念融入合作国的教育系统,促使整个社会体系回归共享的价值观,进一步加强文化互信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为“走出去”项目的持续运行提供潜在支持。

二、回顾与审视: 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帕森斯认为,构成社会的四项基本功能——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和模式维护——分别对应四个主要的子系统:经济系统

负责适应环境,政治系统负责实现目标,社会系统负责协调整合,文化系统负责保持和传承模式。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在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中分别面临目标达成、环境适应、整合和模式维持的可持续发展困境。

(一) 政治系统: 目标达成的困境

政治系统负责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确保社会系统设定并实现其宏观目标和战略。在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的合作模式中,政治系统通过制定和实施宏观和微观政策,为校企合作提供方向和支持,但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有效的顶层设计应包括明确的合作目标、战略方向、职责分配和执行路径,政策供给需要全面覆盖教育合作的各个方面。然而,现实中常出现政策落实不到位、目标模糊和执行路径不清晰等问题,阻碍了合作项目的持续健康发展。尽管政策文件提出了推动高职教育国际化和校企合作“走出去”的宏观目标,但在具体实施中缺乏细则和操作指南,导致学校和企业在选择合作项目、制订合作计划、评估合作效果等方面,往往因为缺乏明确的指引而难以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合作项目的质量和效果大打折扣。例如,跨国合作中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和商业环境差异较大,对于如何与中外企业进行有效对接,如何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如何克服文化和法律障碍等问题,都需要给予详细的指导和支撑。这些具体执行问题在政策文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和解决,宏观目标与具体目标的衔接也不够紧密,导致建设单位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应对这些复杂性,增加了操作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合作项目的质量和效果。

(二) 经济系统: 环境适应的困境

经济系统负责执行适应功能,通过提供利好政策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整合并利用国内外经济资源以支持协同发展。然而,这一系统面临多重适应环境的困境。首先,政策的时效性和更新速度往往滞后于实际需求,导致政策难以发挥预期作用。全球市场环境瞬息万变,而政策制定和更新过程较长,导致其实施时已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企业和学校因此无法有效调整市场布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明确指引,降低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其次,资金短缺和资源配置不均也是制约项目推进的主要因素。一些地区和项目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无法吸引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设备,导致项目质量不高。资金短缺还会限制学校和企业在项目中的研究和开发投入,阻碍创新和发展。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使得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国际合作中处于劣势地位,难以与发达地区的项目竞争。此外,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和学校难以获得必要的市场信息和资源,导致项目与实际市场需求脱节。市场资源的获取难度同样制约项目推进。许多高职院校和中资企业在“走出去”项目中,面临进入新市场所需网络和关系资源缺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项目无法顺利展开合作,甚至可能因资源获取不足而中途夭折;最后,全球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对“走出去”项目提出了更高的适应要求。缺乏足够的市场调研和预见性规划使得这些项目难以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例如,一些项目在进入合作国市场时,由于未能充分了解当地的教育需求和行业

状况,导致课程设置或培训计划无法获得市场认可,从而影响了项目的成功率。

(三) 社会系统: 整合的困境

社会系统负责执行整合功能,确保内部成员之间的协调和谐,同时有效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目前,社会系统面临多重整合的困境。首先,多元利益在协调上存在一定困难,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期望各不相同。高职院校侧重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提升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中资企业关注技术和市场拓展,期望通过合作获取先进技术并拓展海外市场。外方院校则强调本地化教育需求,要求合作项目符合其教育体系和文化背景。而项目所在地政府则希望提升本地教育质量和经济发展,期待合作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导致各方难以达成共识,合作推进困难;其次,各方在文化背景、教育理念和管理风格上存在差异,导致沟通障碍和合作摩擦。语言障碍加剧了这些问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沟通风格和表达方式容易引发误解和冲突。此外,由于信息交流机制不健全,各方难以了解对方的需求和动态,也会影响决策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例如,中方和外方对市场变化和政策环境的了解不足,导致决策失误和合作效果不佳。信息不对称还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和机会错失,使合作项目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最后,在跨国合作中,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差异使得各方在建立信任和长期合作关系上面临挑战。由于缺乏长期合作的历史,各方对彼此的信任度较低,而政治背景和国家政策的差异也可能影响合作的稳定性。例如,双方所在国的外交关系和贸易政策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合作项目的推进。

(四) 文化系统: 模式维持的困境

文化系统负责执行模式维持功能,强化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的内化和传播,促进中华社会文化及价值观的连续性与认同。高职院校与企业共同“走出去”进行的是深度的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然而,跨国教育合作面临文化适应性不足的挑战。不同的教育文化背景会产生误解和冲突,导致推广和内化困难。例如,中方教师可能会觉得合作国学生缺乏纪律性和集体意识,而合作国学生则可能认为中方教育方式过于僵化和缺乏灵活性。在教学内容方面,中国职业教育课程通常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合作国的教育体系可能更侧重于实用技能和职业培训,忽略了一些理论基础的教学。这种内容上的不一致,可能导致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不同,影响学习效果。评估和反馈机制方面的差异也会引发冲突。中国的教育体系往往采用集中式的考试和评估方式,而许多合作国则更倾向于持续评估和项目式学习。这种差异可能让师生在理解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上产生误解,进而影响教学的顺利进行。此外,师生关系和互动方式上的文化差异也可能带来挑战。中国的师生关系通常较为正式,教师在课堂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一些合作国,师生关系可能更为平等,学生在课堂上有更多发言和参与的机会。这种互动方式的不同,可能让中方教师感到学生缺乏尊重,而合作国学生则可能觉得中方教师过于权威,不利于自由表达。

三、整合与调试：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结构功能主义生态的构建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秩序、行动和共同价值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5]认为研究社会结构本质上是研究如何通过个体行为在特定的规范准则下实现秩序的问题。在此框架下,笔者认为高职院校与企业协同“走出去”的实践可以通过明晰地位—角色、建立制度规范,以及内化共同价值,共同构筑“走出去”的生态框架。

(一) 明晰地位—角色

帕森斯认为,地位和角色是社会体系的基本单元,地位定义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角色则表达了社会对这一位置的行为期待。在高职院校与企业协同“走出去”的合作模式中,通过明晰各方的地位和角色,可以有效激励各参与方清晰界定自身定位和承担的角色,从而在尊重彼此期望和需求的基础上,建立并维护有效的多边合作关系。高职院校与中资企业应共同作为教育资源提供者 and 人才培养者,在充分考虑合作国教育和行业需求的基础上,制订满足实际需要的教育方案,包括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进行本土化调整,以提高学生的接受度和学习效果。企业应利用产业优势支持教学实践和学生就业,提供实践培训和就业机会。政府机构应承担政策制定和资源整合的角色,提供政策、资金和制度保障,促进“走出去”项目的顺利实施。国际伙伴如外方院校和项目所在地政府应作为文化和制度协调者,帮助中方适应并融入当地环境,并积极参与合作项目的规划和实施,确保其成功推进。明确各方角色和职责,有助于加强政策落实,优化资源配置,增强跨文化理解,促进信息共享和信任建立,实现合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二) 建立制度规范

在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下,秩序被视为社会结构的本质,强调通过规范化的行动维持社会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化不仅有益于指明行为规范,也能为合作提供框架和方向。制度化的行为越多,越有利于预测和控制人们的行为。^[6]高职院校与企业协同“走出去”的实践需要建立一系列制度程序来指导合作行动,以确保双方合作的高效性、目标一致性以及风险最小化。其一,建立明确的政策执行细则和操作指南,确保政策实施的连贯性和透明度,通过制度化的目标设定和评估机制,定期评估合作项目的进展和成果,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方向,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和需求;其二,制定详细的资源分配和管理制度,确保资金、教育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建立灵活的应对机制,以适应全球市场环境快速变化和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其三,建立多元利益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合作流程,减少跨文化整合的障碍,增强各方协同效率;其四,建立跨文化培训和交流制度,包括语言培训、沟通技巧培训、定期交流项目、互访和联合研讨会等,以促进各方对彼此文化和教育理念的理解,减少文化冲突,增进信任,确保教育模式的有效推广和内化。

(三) 内化共同价值

在高职院校与企业协同“走出去”的实践中,共同价值的内化需要通过构建主体间性来实现。主体间性指的是不同主

体(如个人、群体或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共享和交流的过程和状态。这意味着高职院校、企业、政府以及国际伙伴之间通过教育合作的动态互动,促进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价值共享。第一,建立多方对话和协商机制,增强各方对合作目标和政策的认同感,确保各方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有参与感和归属感。通过定期会议、工作访问和论坛等形式,鼓励各方充分表达意见,形成共识。第二,促进跨国资源共享和互惠机制,实现资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有效流动和合理配置,增强各方对合作经济效益的共同认可,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资源共享,确保项目在各方支持下顺利进行。第三,搭建多层次的文化交流和培训平台,促进中外各方在文化背景、教育理念和管理风格上的相互理解,减少跨文化冲突和摩擦,增强项目的凝聚力和协调性。例如,通过教师和学生交流项目、管理层的互访培训以及跨文化沟通工作坊等方式,推动各方在文化上的相互认同。第四,建立跨文化教育项目和合作研究平台,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模式融合国际教育标准,促进各方对共同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内化,实现文化和教育模式的有效传播和推广。

四、结束语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高职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只有通过对各子系统功能的协调一致,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就需要加强合作过程中秩序、行动和共同价值体系的作用,构建稳固的“走出去”生态框架。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在“走出去”项目中更有效地实现学校与企业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在合作国家的行业标准与文化背景下,制定切实可行的合作策略。需关注协同过程中各子系统的动态调整机制,以确保在应对国际市场变化时具备灵活性与适应性。同时,通过政策支持与机制创新,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助力中国企业提升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共建“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EB/OL]. [2023-10-1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0/content_6907994.htm.
- [2] 雷雨露, 孙宜学.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孔子学院教育发展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02): 120-124.
- [3] [美]戴维·波普诺. 我们身处的世界[M]. 李强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3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职业教育标准、资源和装备建设指南[EB/OL]. [2023-7-18]. <https://zj.chinaafse.cn/c/2023-07-18/1820.shtml>.
- [5] 周怡. 社会结构: 由“形构”到“解构”: 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J]. 社会学研究, 2000(03): 55-66.
- [6] [美]彼得·L. 伯格, [美]托马斯·卢克曼. 现实的社会建构[M]. 汪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